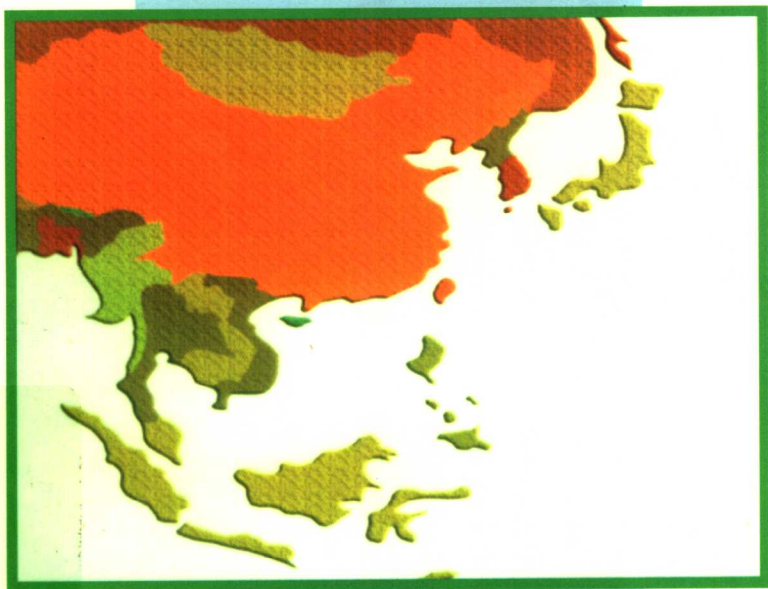


本书获2000年日本总合研究开发机构 (NIRA)
第一届“大来政策研究奖”

现代东亚经济论

〔韩〕安忠荣 著 李相文 译
李相文 校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东亚经济论

〔韩〕安忠荣 著
田景文 等译
李相文 校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东亚经济论/(韩)安忠荣著;田景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
ISBN 7-301-06835-2

I. 现… II. ①安… ②田…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东亚 IV. F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245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4-0556

GENDAI HIGASHI AJLA KEIZAI RON

by Ahn Choong Yong

© 2000 by Ahn Choong Yong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2003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4

by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本书中文版专有使用权归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

书 名: 现代东亚经济论

著作责任者: [韩]安忠荣 著 田 景 等译 李相文 校译

责任编辑: 梁鸿飞 刘云艳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835-2/F·075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7.5 印张 215 千字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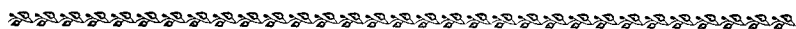
定 价: 16.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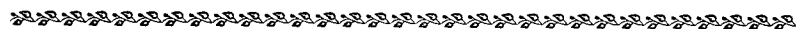
日文版《现代东亚经济论》 获奖评语

本书的日文版《现代东亚经济论》(日本岩波书店,2000)荣获日本经济企划厅下属的总合研究开发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 NIRA)评选的第一届“大来政策研究奖”(2000年11月22日)。



日本总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大来政策研究奖”评审委员会评语

- 东亚经济一度持续高速发展,被誉为“经济奇迹”,却突然爆发了货币外汇危机。现在,东亚各国通过结构调整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迹象。在评价东亚经济时,有人认为奇迹不过是一种幻觉,也有人认为危机是外国投资资本横行所造成的一时性现象。
-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维持至今的“产业优先、金融从属型”体制不适应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世界经济现实。作者对从成长到危机、从危机到再成长的曲折发展过程,用一贯的观点进行了诊断和展望。
- 作者以担任国际机构和韩国政府顾问的经验为基础进行现象分析,并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方案。本书严密的结构和丰富的政策性启示得到了高度评价。



第一届“NIRA 大来政策研究奖”评审委员

-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香西泰
- JT 生命志研究馆副馆长:中林桂子
- 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理事长:山本正
- 拓植大学国际开发学部长:渡边利夫
- NIRA 会长:小林阳太郎
- NIRA 理事长:盐谷隆英
- NIRA 理事:平野正宣



“大来政策研究奖”为纪念在日本经济和外交政策研究方面 作出杰出贡献的大来佐武郎而创设

大来佐武郎,1914 年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系,1962 年获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外务省、经济企划厅高级官员,曾任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第一任理事长和海外协力基金总裁,1975 年任大平内阁外务大臣,后任国际大学校长、NIRA 研究评审会议长,是引领日本全球化的代表性智囊和世界通人物。曾荣获日本政府“勋一等旭日大章”、Ramon Magsaysay (菲律宾前总统)奖、英迪拉·甘地和平裁军开发奖等。著有 *Japan in the World Economy* (1975), *The Developing Economy and Japan* (1980), *The Japan's Challenge Years: Reflections on My Life Time* (1983) 等多部著作。

内 容 简 介

本书的日文版是2000年2月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2000年11月获得NIRA颁发的第一届大来政策研究奖。2001年8月,在日文版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补充,在韩国出版了韩文版。

本书首先分析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金融、贸易和直接投资跨越国境、地区间和国家间相互依存逐步深化的过程,接着从全球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此,本书分析了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东亚先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的优缺点,提出这些国家(地区)应当与发展条件和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地区)进行相互学习。同时,本书强调,21世纪韩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必须遵循多边主义理念,在与中国、日本、东盟国家等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的框架下探索。

作者简历

韩国庆北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美国夏威夷大学硕士(东西方研究中心项目)

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2002—至今)

韩国中央大学政经学院经济系教授(1974—2001;现停薪留职)

世界银行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顾问(1978—1996 年间先后 12 次)

马来西亚总理府经济企划厅工业化综合开发计划研究团团长
(1991—1992)

韩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1990—1992)

日本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文部省邀请 1994)

韩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1995)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理事长(1996—1999)

韩国经济发展学会会长(1998)

韩国中央大学国际研究生院院长(1997—2000)

韩国总统经济调整会议委员(1998—1999)

韩国国际通商学会会长(2001)

韩国国民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1999—2002)

韩国朝兴银行理事会议长(1998—2002)

作者主要论文、著述

- [1] "A Search for Robust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Mutual Learning from East Asian Experienc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2, No.3, 2001.
- [2] "Corporate and Financial Restructuring in South Korea: Accomplishment and Continuing Challenges",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001.
- [3]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East Asian Responses*, co-edited, Graduated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1, Chung-Ang University, October 2000.
- [4] *Competi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coauthored), Edward Elgar, UK, 1999.
- [5] *A Dynamic Input-Output Forecast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Malaysia*, UNDP/UNIDO, 1992.
- [6] "A Model o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in a Multi-crop Economy: The Case of Korea", coauthore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63, No. 4, 1981.
- [7] "A Dynamic Multi-Commodity Model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 Regional Application in Brazil", coauthore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 1979.
- [8] "外向型贸易政策和产业发展",《韩国经济半世纪:历史评价和二十一世纪展望》,车东世,金光锡编,韩国开发研究院,1995。
- [9] 《现代东亚经济论》日文版,东京,岩波书店,2000。
- [10] 《基础计量经济学》,合译,真英社,1994。

获奖情况

- 1984 年获韩国每日经济新闻社第十四届“每经经济学家奖”。
- 2000 年获日本经济企划厅总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第一届“大来政策研究奖”。
- 2001 年获韩国中央大学学术奖。

序

关于“东亚奇迹”和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研究。大致来讲,这些研究试图解释:韩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东亚经济如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曾经创造了奇迹的东亚经济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在 1997 年的短短几个月中先后陷于金融危机的泥潭并使国民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东亚奇迹是否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一般意义?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东亚经济的发展前景如何?这些经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道路?等等。

对于上述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有了一些主流看法,但是,分歧依然存在,因此,我们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同时,作为一种致用之学,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影响现实的经济政策。应当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究其原因是研究成果在政府和公众中的传播和被接受的程度还很有限,我们有必要做些努力来将自己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大家。我相信,这些成果的介绍,不管它们的看法是相互一致的还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差别,都会给大家提供有益的信息,促使大家去思考和鉴别并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

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我愿意把这本《现代东亚经济论》介绍给大家。该书的作者安忠荣教授是现任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院长,享誉国际的著名经济学家。作者多年来一直从事韩国和东亚经济的研究并以学者的身份对韩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政府政策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因此对韩国乃至东亚经济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这本书 2000 年在日本以日文由岩波书店出版,出版后

立即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当年获得了日本经济企划厅下属的日本总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设立的首届大来政策研究奖。2001年在韩国以韩文出版,内容上做了些扩充,中文版是由韩文版翻译而成。

以篇幅来计,《现代东亚经济论》这本书并不算长,但其中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作者在书中既研究了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主要东亚经济的工业化历程,也根据这些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分析了它们各自经济发展模式的长处和不足。最后,作者还根据上述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金融危机后各东亚经济体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概括了我在序言第一段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因此,本书可以算作一本对东亚经济发展问题的全面阐释之作。

在本书的论述中,最核心、也最能给读者以启发的是对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表现的解释。作者认为,虽然三个经济体都通过采用政府干预之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因而被普遍地看作“东亚奇迹”的代表,但是,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三者的经济模式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三者在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进而导致它们在面临金融危机时受到损害的程度也出现巨大的差别。——韩国除了接受IMF条件苛刻的金融救济之外别无选择,马来西亚则存在拒绝IMF建议的选择余地,而台湾地区经济则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小。按照三者 in 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来进行对比,台湾地区经济的稳定性和发展的持续性最好,马来西亚次之,韩国最差。

关于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作者主要讨论了两个方面,即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和金融模式的选择。

在产业发展模式方面,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初,曾经实行过对所有产业的出口一视同仁地进行鼓励的政策。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以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成就为基础,进入 70 年代后,韩国政府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将无差别的产业鼓励模式改变为重点支持重机、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改变代表了一种在出口导向模式下向进口替代模式的部分回归。按照作者的说法,即“从 60 年代后半期开始,即使在促进出口型鼓励体制下,韩国政府已表现出把主要战略产业培育成进口替代产业的意志”(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

韩国政府的上述政策调整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后果。首先,“重机、重化工业化因为投资回收周期较长、投资规模大,需要在金融、人力、技术等方面进行巨大的要素投入”(同上,第五节);同时“重机、重化工业化导致了经营的严重不良,重机、重化工业设备处于长期的闲置状态”(同上,第四节)。这也意味着,重机、重化工业中的企业只有在国家的强力支持下才能生存和发展。为了在金融上支持国家的重机、重化工业化发展目标,国家就需要在金融资源的配置方面进行全面的干预,进而形成“官治金融”的金融模式。其次,与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相类似,重机、重化工业化过程导致对进口机器设备的严重依赖,进而导致国家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实际上,“尽管出口迅速扩大,韩国的贸易收支除了 80 年代后期的几年之外一直是慢性赤字”(第二章第三节)。最后,国家对重机、重化工业的大力扶持是以损害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为代价的,其结果就使韩国经济日益成为财阀主导的经济。财阀经济进一步鼓励了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企业相信自己的规模越大国家就越不会容忍企业的倒闭,从而扩大规模而不是提高效益就成为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

与韩国不同,台湾地区在放弃了进口替代之后转而采用了中小企业主导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按照作者的观点,这种中小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有如下几个优点:(1) 促进市场竞争。“与韩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相比,中小企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促进了市场竞争,而政府的参与也更具有市场亲和性”(第四章第二节)。(2) 保

证经济效益。作者认为,优胜劣汰的竞争和中小企业自身的灵活性等原因使得中小企业和整个台湾地区经济成为以提高生产率、经营的收益性和弹性为中心的经济;(3)中小企业的发展所需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因而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积累进行,同时也使得台湾地区“保持与韩国同样的高速增长而投资比率则相对低”(第四章第四节);(4)最后,由于采取了中小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经营失败的企业按照破产法自然地被淘汰而不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影响,因此政府就不需要对金融部门进行大力干预,这就使台湾地区有可能按照现代金融制度的原则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

与韩国和台湾地区相比,马来西亚的经济腾飞相对要晚一些。“但是,20世纪80年代马哈蒂尔总理沿袭东亚工业化模式的‘向东看政策’,仿效韩国重机、重化工业化政策制订了工业化综合计划”(第五章第一节)。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选择“也引发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财政赤字等宏观经济难题”(第五章第二节)。同时,“马来西亚政府对因经营不善而出现亏损的企业,提供了救济金融”(同上)。因此,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模式选择在许多方面与韩国的做法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与韩国主要依靠外债来弥补经常账户逆差的方式不同,马来西亚通过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弥补了经常账户的逆差,因此其对外经济平衡能力要优于韩国。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作者通过上述比较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上和我这些年来在许多研究中所一再强调的“后发优势”,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观点一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本书中文版在北大出版社的出版有助于我国的读者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也希望能够有助于我国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选择一条能够让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道路。

林毅夫

2003年12月26日

中文版序言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 30 余年间,东亚经济一直保持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难得一见的高速增长,被世界银行专家称为“经济奇迹”(The World Bank, East Asian Miracle, 1993)。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经济专家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是值得世界上很多在贫困中挣扎的低收入国家学习的榜样。

在东亚的成功发展模式,香港地区与新加坡的发展战略由于具有城市国家(地区)的特征,对拥有大面积国土和大量人口、存在农业经济的国家来说不具有普遍适用性,而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则超越了城市国家(地区)的界限,它们的发展战略成为东亚(除发达的日本外)最成功的典型。

韩国在 30 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凭借财阀主导的出口模式实现了压缩成长;台湾地区凭借中小企业主导促进出口的方式实现了经济上的增长和分配上的均衡;相对来说,拥有丰富资源的马来西亚起步较晚,但它通过学习韩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发展模式,实施了“向东看政策”(look east policy),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世界范围内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马来西亚实现了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

东亚这三个先行发展中国家(地区)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在金融领域、企业领域和政府职能等方面坚决推行了迈向发达经济的一系列结构调整措施,它们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本书所强调的发展经验的互相学习(mutual learning),深化了市场经济,进而构建了新的发展模式。

目前,世界经济在通过 WTO 进行多方协商的同时也出现了 EU

和 NAFTA 的扩张,这体现了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共存。东亚经济也在孕育着一系列的区域一体化运动。截止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东亚经济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扩大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实现的,但由于美国经济加速调整对东亚的贸易赤字并加强通过 NAFTA 的区域内整合,21 世纪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力除了依赖扩大东亚地区内需外,别无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加入 WTO,东亚经济构图迎来了一个大的转型期。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和从购买力平价指数来看已称得上是经济大国的中国的对外指向性、韩国与东盟的出口竞争力强化等因素迅速提高了东亚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存度。虽然目前东亚区域内国家之间还没有构建正式的合作机制,但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功能性整合”。

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现已扩散到全球的 FTA 等区域一体化趋势打开了东亚国家长期关闭的区域内经济合作的闸门。东亚各国通过《清迈倡议》建立了金融合作机制,并定期举行“10(东盟)+3”首脑会谈与部长级会谈,多方探索政府层面的合作框架。中国与东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建设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研究也正在进行。

在东亚和东北亚,符合 WTO 规则的政府及民间层面的区域内经济合作可以同区域经济一体化联系起来。欧盟在“共存共生”原则指导下,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努力,逐渐构筑起合作的框架,现在终于实现了货币一体化。

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的 GDP 占了东亚 GDP 总额的 90%,而且地理位置相邻,一衣带水,正在形成休戚相关的经济圈。只有三国停止对区域内经济领导权的争夺,实现真正的睦邻友好与经济合作和市场经济的繁荣,才能开创共生共荣的东北亚和东亚经济的新世纪。本书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试图对包括市场原理、对外指向、引进全球化标准制度、创造知识经济在内的东亚经济的发展途径进行剖析并

提出今后面临的课题。

本书中文版得以和读者见面,首先要感谢延边大学的田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的李相文教授为本书的翻译费神劳力,感谢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中国研究组的李章奎博士、赵显垚博士、池晚洙博士为书稿的修改斟酌词句。

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梁鸿飞先生和田秀玲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感谢日本岩波书店的高村幸治先生提供了积极的协助。尤其要感谢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他热情推荐本书并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了序言。为使本书能更准确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林教授对中文书稿的内容,甚至是语句修改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最后,要特别感谢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北京代表处的朴月罗所长,如果不是她不辞辛苦地奔走,本书中文版恐怕难以面世。在此也对该代表处荀寿潇为整理和校对中文稿件付出的辛劳表示感谢。

本人将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看作是研究剧烈变化的东亚和东北亚经济的新起点,衷心希望中国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安忠荣

2003年12月于汉城

韩文版前言

本书是2000年2月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现代东亚经济论》(日文版)的韩文修正补充版。21世纪韩国经济的新模式必须在东亚经济这个大的框架内构建,为了强调这一点,韩文版书名改为《现代韩国·东亚经济论》。

二战后的40余年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韩国与台湾地区一起快速转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它们的发展战略及采用的政策措施都被评价为东亚经济模式的典范(世界银行,1993)。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是城市型国家(地区),而韩国拥有一定规模的国土和人口,因此,韩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东亚是具有代表性的。但是,要对韩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更全面的评价,还要同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国(地区)进行比较和分析,因此,本书既是“韩国经济论”,同时又可视为“东亚经济论”。

1997年初,笔者开始构思本书的基本框架。当时,以韩国经济模式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仍被誉为东亚经济的奇迹。保罗·克鲁格曼教授(1994)指出靠要素投入主导增长的东亚模式的局限性时,还没有人预测到东亚经济即将陷入金融危机的漩涡。

在为时三年的写作过程中,笔者目睹了陷入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的改革与结构调整,其中自然也包括韩国。亚洲金融危机持续的那段时间,笔者像观察试管内的化学反应一样,目击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变化。

笔者当时同意这样的基本假设: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经济模式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出口主导、政府积极进行政策介入、人力资本的积累等,这一模式仍是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及在贫困中挣扎的落后发展

中国家可以借鉴的“健康模式”(robust model)。但是,当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向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香港地区和韩国扩散时,笔者考虑到东亚经济所面临的结构调整的诸多课题,对东亚经济模式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过去 30 多年里,韩国以财阀主导型“压缩成长”战略实现了高速增长,台湾地区以中小企业主导型战略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均衡分配,马来西亚工业化起步较晚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在出口主导和政府主导型的东亚发展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典型。因此,在构思本书时,笔者把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定义为东亚的先行发展中国家(地区),并深切感觉到对它们的发展战略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本书理应包括对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结构调整内容及效果进行追踪考察的内容。

本书框架基本形成时,泰国发生了货币危机。外汇危机向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扩散时,台湾地区却风平浪静,这使笔者更加坚定了平时对台湾地区经济的信心。与韩国不同,马来西亚为克服金融危机采用了所谓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的“剧药”处方。马来西亚之所以能采取资本管制政策,是因为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一直实行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和开放政策。

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和马来西亚分别采用了各具特色的方法进行结构调整,判断它们的结构调整的真正效果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998 年初,国际经济专家们曾预言,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东亚经济的衰落将使东亚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陷入不景气和高失业状态。但是,1999 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从有史以来最差的 -5.8%(1998 年)跃升到 10.2%,马来西亚经济的增长率也从 1998 年的 -6.3% 跃为 5%。

遭受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出人意料地迅速恢复了经济,因此,有些人认为东亚国家的经济基础还是比较好的,金融危机只是国际短